



笔作刀枪：庄禹梅的抗战生涯

庄禹梅(1885—1970)，宁波镇海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浙江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代表、宁波市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宁波市政协第一届至六届副主席、民革宁波市委第一届至三届主委等职。

以报为媒开展抗日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迅速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蒋介石推行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反蒋运动。

庄禹梅所在的时事公报社率先响应，于2月1日发出募饷通告，明确指出“十九路军之胜败关系上海之存亡，而上海之存亡实关系全国之安危”，大力呼吁全城人民“缩衣节食，踊跃输将，救国保种”。这一呼吁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自愿捐款、捐物。21日,《时事公报》刊登前方急需咸光饼(干粮)的消息后，宁波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购买，各饼店也彻夜赶制，全力支持上海抗战。

6月1日，庄禹梅在《时事公报》十二周年纪念特刊上，以“平青”为笔名发表了《非战与反战》一文。文中敏锐地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现端倪，提及罗曼·罗兰倡议召开“国际非战大会”以制止战争爆发，并大声呼吁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国内劳动群众携手向帝国主义进攻，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世界的革命战争。此后，他还创作了两篇短篇小说，其中《阿章的儿子》讲述了义勇军抗日故事，可惜原稿在寄往上海途中遗失。

1934年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宁波组织读书会，副干事尹宗良邀请庄禹梅入会，庄禹梅表示“容我考虑一下”。然而，因参会叛徒柴荣向警察局告密，庄禹梅、尹宗良等人不幸被捕。次日，他们被移送杭州接受蓝衣社谍报组审讯，随后被关入省高等法院监狱。由于尹宗良如实供述，法院未对庄禹梅提起诉讼。

庄禹梅回到宁波后，先后在多家报社任职，但工作时间都不长。他在《宁波大报》担任编辑，在《中南日报》担任副刊编辑，还在《镇铎日报》担任主编。

1936年11月，袁关福创办《商情日报》并自任社长，邀请庄禹梅担任编辑主任，钱志杭、周祚生担任编辑员。该报立场鲜明，大力鼓动抗日，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庄禹梅在报上发表了署名“醒公”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抗战的连载通俗小说《牺牲者》，署名“屈”的时政评论《赏菊》《逼谈》《为生活而抗日》《“逼谈”改“童话”》等。这些作品高度赞扬了人民大众的爱国

热忱和抗战斗志，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强烈呼吁进行全民族抗战。

12月14日晚至15日晨，宁波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在城乡秘密搜捕“宁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员范雨峰、邬家箴等12人。15日，《商情日报》发表社论《不要忘却抗日》，郑重指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人注目，但不要忽略绥远抗日局势。要团结一致，做绥远后盾，不应发生内变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17日又发表署名“屈”的《丑表功》，巧妙运用借物喻人的手法，对反动当局进行深刻的讽刺与批判。

《商情日报》的正义言论极大地激怒了国民党当局。1937年1月，宁波地方法院接到省高等法院批示，查封了《商情日报》，并逮捕了庄禹梅等4人。他们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随后被押解至杭州高等法院监狱服刑，后被予以交保释放。

投身抗日组织与活动

返回宁波后，庄禹梅随即进入《宁波商报》工作，负责副刊编辑。10月，浙东临特正式成立。11月，浙东临特积极开展工作，在鄞西洞桥天王寺举办“鄞县抗日民众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内称“飞鹰团”)。县长陈宝麟兼任团长，鲍浙潮担任副团长，竺担任联络股长，朱镜我、庄禹梅担任政治教官，县社训总队的两名督导员周锦、于凤园担任军事教官。该训练班吸引了80余名学员，他们除了学习军事知识外，还深入学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社会科学知识。受训人员分组前往各乡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为了给飞鹰团讲授抗战时期的文化工作，庄禹梅不辞辛劳，从宁波步行前往天王寺。在城区时，他利用工作之余编辑团刊《野战》，由他所在的宁波商报社印刷，共出版了两期。

训练班结束后，经组织讨论，鲍浙潮、竺扬两同志证明，恢复了庄禹梅(1929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失去组织关系)的党籍，并指定鲍浙潮为直接关系人。

与此同时，浙东临特机关驻地从鄞东观音庄迁至城区南门外船埠巷，并在城区积极发展党员。庄禹梅接到上级指示，在《宁波商报》馆尽快建立党支部，以扩大党在新闻界和全市的影响力。于

是，他先后发展了朱仲伦、周康靖、陈悦琏、周序曾等人入党，后成立了抗战时期宁波城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宁波商报馆支部，并担任首任书记。

1938年2月至5月间，庄禹梅和他的支部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首先，以报社名义召开青年职工读者座谈会，主题为当前的战争局势。通过座谈会，增强大家对长期抗战的认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进而组织抗战后援会及发起组织新闻界抗战后援会。其次，翻印出版宣传抗战和游击队的小册子十余本，每本印量约2000册，广泛传播抗日思想。最后，使宁波商报社成为各方面进步人员过境宁波的中转站，为抗日力量的汇聚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1938年5月，中共宁波特委成立，浙东临特撤销。同月，中共鄞县县委在城区大河路64号成立。受县委指派，庄禹梅在“鄞县抗日自卫会”(前身为“鄞县抗战后援会”)担任委员并主编会刊《迅雷》。不久，他又担任县战时文化事业推进委员会委员，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他以县抗卫会的名义，在商报馆等处多次举办抗战形势和任务座谈会，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以及包括国民党员在内的广大爱国人士。座谈会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论调，积极宣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39年，国民党的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措施。国民党宁波地方当局怀疑报社有“异党”分子活动，通知庄禹梅等人去警察局“谈话”，时任县长兼警察局长俞济民还对报社负责人施压。庄禹梅一面宣称离职，一面仍在江北岸蔡家边的家中为《宁波商报》编辑副刊，继续领导支部活动，并介绍吴唐华入党。

同年3月，中共鄞县县委撤销，建立中共宁波中心县委。次年3月，中共宁波特委成立，宁波中心县委撤销。在此期间，庄禹梅曾一度以泗洲塘天主教保禄大修道院开设的私立毓才中学文史教员的身份作为掩护。

沦陷时期坚持抗争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日伪迅速劫夺时事公报社，汉奸卢孟瑜

企图出版伪报。卢孟瑜胁迫庄禹梅出任主编以欺骗读者，但遭到庄禹梅的严词拒绝。次日黎明，庄禹梅便毅然离开蔡家边，雇船回到庄市老家隐蔽。

同年冬，时任定海县工委委员的王起，委托赵士圻陪同庄禹梅前往定海，住在城郊的庵堂里，负责编辑党员学习文件。然而，由于定海城中唯一的印刷所不敢承印，此事最终未能完成。1942年2月9日，庄禹梅回到宁波蔡家边，并设立秘密招待所(党的地下接待站)，招待来购买物资以及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组织上给庄禹梅发放津贴，以解决他的生计问题，他仍受王起(此时为三东工委副特派员)领导，联系人仍为赵士圻。

1943年底，赵士圻(此时为浙东敌工委所属庄市区指导员)通过庄禹梅联系上宁波的吴唐华，开展收集敌伪军情报和运输军需物品等工作。1944年春，庄禹梅按照根据地党组织的要求，动员宁波码头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叶永法、周宝法等入秘密前往四明山根据地，参加根据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等活动，以提高他们的认识。这些工人返回宁波后，庄禹梅组建了“宁波码头工人反日同盟会”，团结进步工人，开展反日斗争。

1945年1月，庄禹梅动员天主教神父兼私立毓才中学校长舒其谁前往四明山，参加1月23日在余姚梁弄召开的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同月，应浙东区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召唤，由赵士圻协助安排，庄禹梅前往四明山梅岭城工委(对外称“大陆商场”)，参与根据地的新闻工作。城工委书记王文祥、组织部部长王起、宣传部部长王槐秋等先后与他约谈。

在梅岭期间，庄禹梅还派妻子朱碧心返回城区，动员两个码头工人组长和一个帮会成员到梅岭。由庄禹梅向他们讲述抗战的意义，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庄禹梅原本还打算动员纱厂工人，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0日，新四军浙东纵队、浙东党政机关人员等分批北撤，除少数留守人员外，最后一批于10月7日渡海北上。

10月10日，由于庄禹梅年老体衰，无法适应北撤条件，他和妻子从根据地回到宁波，暂时隐蔽在槐树路163号原时事公报社同事俞露家中。(据《团结报》)

董元度和《旧雨草堂集》

董元度，字曲江，别号寄庐，清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平原县董路口村人。幼承家学，年少便以春柳诗见长，与其父董思凝皆因作诗闻名。

董元度一生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喜郊游，善吟咏。少时偶然作，中年活跃在京都及大江南北诗坛，“掉鞅于术艺之场，游刃乎文翰之林”；晚年与南屏诗社商榷文事。读史书，写诗歌，长年坚持不懈。著《旧雨草堂集》，刊于乾隆四十三(1778年)年末，以诗鸣世。

《旧雨草堂集》的出版离不开杭州南屏诗社友人的鼎力支持。

清乾隆九年(1744年)，杭世骏落职旧田，以原西湖吟社和湖南诗社为基础，会聚在杭文人、诗僧，共结南屏诗社，寄情山水，歌咏太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董元度与申南屏、梅皋，在会城(山东省会济南府)商榷文事。申南屏，钱塘(今杭州市)人，新安县令。梅皋，即万廷兰，南昌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通州知府。曾刻印《太平寰宇记》，并纂《南昌府志》。《申南屏明府来会城》将申南屏《古体诗三十韵》、梅皋清品同附诗后，是董元度与江南诗人关系密切的历史见证。申南屏、万廷之均为杭州南屏诗社成员。

申南屏出薪俸为刻书之费，万廷之校对文字。万廷之在《旧雨草堂集·后序》中说：“寄卢‘其续作重订以质诸南屏，则今日之举，真为不朽之盛事。’”

在当时《旧雨草堂集》可谓巨著，内容包罗万象。出身名宦之家的董元度饱含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多篇“接地气”的诗文。他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青年时作《苦旱行》描写平原连续二年天旱不雨，农家“老妇呜咽稚子泣”的凄凉景象，他“向城中比限去”，去查阅“官衙征比簿”。他关注社会。《十老诗》描写了清代社会常见的十种人物，从各个侧面和角度反映现实生活。他向往古代神话中“天心归大统”的社会，诗曰“赤帝真人主，重灌亦丈夫。天心归大统，霸略惜先驱。”

他熟读史书，知识渊博，诗作引用诸多典故。《淮阴怀古》：“直得真王死，当年跨下身。汉家轻负尔，隍塞竟何人。钟至含冤日，河干乞食辰。初终两女子，恩怨总成尘”。八句五言诗，综述韩信的一生。

他对诗歌研究颇有建树，留下多种诗体。《十月八日自安远奉檄赴赣州共得短律八首》的“短律”诗体是少见的，可见其诗词功底之深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拔贡、山西布政使、诗人刘大观在《董秋樵槐雨书屋诗·序》说：“两江制府默庵公、太史曲江公，旨以诗著名天下。”

1993年《平原县志·人物》：“董元度，1787年卒，葬于邑西南锅塘口村南里许董氏墓地。翰林院庶吉士，改授江西安远县知县、东昌村学教授，敕授文林郎(正七品)。”(据《联合日报》)

李大钊改名

李大钊的父亲叫李任荣。李任荣非常有才华，却不幸染上了严重的肺病，肺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染上了几乎就等于死亡。李任荣病逝时只有22岁，其时，妻子周氏已有两个月身孕，李大钊是遗腹子。

李大钊出生时，其祖父到大门外的一处园子里转悠，发现棉花秸秆上落了一只百灵鸟。祖父走上前，想看个仔细，这百灵鸟却不怕人，居然没有飞走。一进大门，就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儿媳生了个男孩。祖父大喜，忙把百灵鸟的事儿说给大伙儿听。众人皆称奇：“百灵鸟临门，孩子出世，干脆，这个孩子就叫‘灵头’吧！”祖父想了想，说：“还是给这孩子起个和‘灵头’相反的名字，叫‘憨头’吧！”于是，“憨头”就成了李大钊的乳名。

李大钊最初的学名叫李耆年，字寿昌，是一位十分喜欢他的私塾先生给起的。李大钊父亲死得早，先生起名的意思是希望他能长寿。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李大钊给自己改名“大钊”，字守常。“钊”者，刀也；“大钊”者，大刀也，他立志要用大刀铲除人间不平之事。李大钊改名又有一说，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时，他依扬雄《方言》中的“钊，远也，燕之北部曰钊”，改名为李大钊，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那么，“守常”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时，李大钊曾说：“我活着只想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人，这就是我平生最大的志愿。”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人，这应该就是李大钊一生坚守之“常”吧。

2023年6月26日，在第二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研讨活动上，全国第一家以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字“守常”命名的研究机构——守常研究院，在北大红楼正式揭牌成立。(据《人民政协报》)

司马迁笔下的“势利眼”

史家的任务是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即使有褒贬也会深寓于对人物、事件的记述之中。不妨翻开《史记》读读司马迁笔下的“势利眼”。

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借“翟公”之口记下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翟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这位“翟公”的生平事迹别无他载，连其大名也无法考证了。但他的门客却因了太史公的不朽之笔，成为千古留存的“势利眼”标本。与翟公的宾客相类似的是赵国名将廉颇的门客。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这伙门客则更为直露，更加“坦率”。自己那般势利，不知自省，还振振有词，反说老将军“见之晚”。

还有一伙“势利眼”，是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家人，顶势利的莫过于他的尊嫂。当初苏秦师从鬼谷子门下，自以满腹经纶，无往不胜。于是离开家乡洛阳，西行游说列国诸侯。哪知“出行数月，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无不窃笑，骂他“释本而事口舌”，穷困而返乃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待到苏秦以“锥刺骨”精神发愤苦读，学成再次西游，身佩六国相印，衣锦荣归之日，则是又一番景象。司马迁笔下的这段文字最为精彩：“(苏秦)行过洛阳……苏秦之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这位嫂于“坦率”得可爱。同前面那伙门客相比，她虽是长发妇人，而其见识并不见得短浅，不独看到了苏秦的政治地位(位高)，更注意到了小叔子的经济地位(金多)。(据《联谊报》)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里的“女子火线桥”雕塑。(资料图片)

踩慢跑尽量走中间。

暮春的气温虽已转暖，夜晚的河水却凉气袭人。桥下的妇女们咬紧牙关坚持着，肩膀压疼了，就用双手托着；腰挺酸了，就弯下身子弓着背驮着。就这样，在1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整支队伍从这座“人桥”上通过，火速奔向孟良崮战场。

任务结束后，32名妇女带着门板各自回家。在她们看来，这件事没什么可炫耀的，于是谁也没多提。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红云岗》剧组到临沂体验生活时，这件事才被剧组创作人员知晓。由于时间的流逝，这32名架桥的妇女中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可她们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人

们心中。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勤劳朴实的沂蒙妇女在党和人民军队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她们因党的教育而觉醒进步，因翻身解放而光彩照人，因战争洗礼而忠贞坚韧。在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在前线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毫不犹豫地扒下房屋上的干草喂军马，找出珍贵的陪嫁布匹做军鞋，拿出仅有的粮食献给子弟兵，送子送郎上前线。她们中许多人只留下像“张大娘”“李大嫂”“段大姐”这样简简单单的称呼，却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

沂蒙红嫂的事迹像滔滔不尽的沂河水，说不完、讲不尽。据不完全统计，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沂蒙妇女共做军鞋315万双、军衣122万件，碾米磨面11716万斤，救护伤员5.9万余人，掩护革命同志9.4万余人，用生命和热血支援革命、用肩膀与男人们共同撑起战争的胜利。

如今，“沂蒙红嫂”早已不再是一个、一个群体，而是成为爱国奉献的代名词之一。她们不仅是模范“沂蒙六姐妹”、乳汁救护伤员的明德英、精心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王换于，还是新时代下的“沂蒙新红嫂”于爱梅、“最美兵妈妈”朱呈镨、“沂蒙扶贫六姐妹”……她们展现的“爱国爱军、忠诚坚韧、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红嫂精神，像一条永恒的河，淌过历史的天空，越过记忆的河床，流向远方，流向未来。(据《中国国防报》)